

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一直从事科研工作,却意外成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

“我一定要看到学校的生死”

本报记者 任鹏

“如果你跪下他们就租给你,你跪吗?”

8月中旬的北京,快开学了,燕兆时的学校暂时没有因为附近区域可能出现的拆迁而搬家,这让燕兆时悬着的心放下一半。

这个担心已经缠绕了他一个多月。

学校搬到这里才一年,如果再搬家,燕兆时不敢保证,学校是否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而裁减学生,或者消失。

6月底,听说学校周围可能会拆迁时,燕兆时曾到处寻找合适的校址,有人问他:“如果你跪下他们就租给你,你跪吗?”

“当然,这太简单了。”

一年前,学校还在唐家岭,燕兆时也只是一名支教志愿者,不必操心学校的生死,来去自由。

这是北京一所很普通的打工子弟学校。

一年前,学校同样遭遇拆迁问题。去年7月,学校接到通知,7月30日是搬迁的最后期限。租到合适的地方很难,改造又是一笔费用,学校的校长夫妇很难承受,找燕兆时和朋友帮忙。

“这样一所打工学校会出现很多问题,我们连帮他的话都没敢说。”

所以,燕兆时依旧当着志愿者,上着自己的课。

7月下旬的一天,他和朋友去学校时发现,一辆厢式货车拉走了校长的一部分物品。

之前,燕兆时听校长说过“太困难了,不想干了”,没想到这次是真的。

去问校长,没有得到期望的答案。

燕兆时和朋友两个人面面相觑。

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:不吭声,校长走了,学校就彻底停了;不想让学校停,就得做些实际的事。

上课,毕竟相对简单些,可要负责这个学校,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?

“你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?”朋友问。

“大不了过俩月就倒闭了。”燕兆时回答。

“过俩月再倒闭,会比现在还坏吗?”

“至少,我们还好好教了两个半月啊。”

“既然过俩月再倒闭比现在要好,那你有什么好怕的呢?”

“你不怕我也不怕,大不了过俩月倒闭。但还有可能过俩月不倒闭呢。”

担起一所学校的重担,就这么简单。燕兆时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段对话,因为它虽然很短,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太多了。

“考虑了又能怎样?就两条路:关或不关,管或不管。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接下来的一个多月,几乎让燕兆时抓狂。

燕兆时和朋友们疯狂地找地方,最终找到了现在这处家具厂仓库。

这是唯一一个能装得下所有学生,而且房东愿意出租的地方。订合同、搬家、改造、装修……

2010年8月20日,学校正式报名;25日开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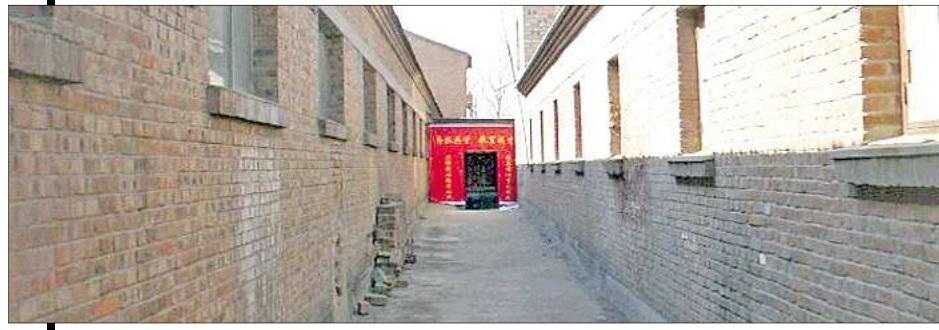
校长暂时留下来,这时候,燕兆时和朋友们还只是帮着他管理教学。

一个学期后,原来的校长还是

北京人燕兆时的人生,在42岁时,意外地转到了另一个路口。去年7月之前,北航毕业、研究自动控制的他还是一名科研人员,做飞机结构试验的工作,在北京繁华的二环路上班。原本只是想做一名支教,但毫无准备,他成了北五环外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全职校长,管理着200多个孩子,每个学期补贴4万多元的亏损。可是,他不能中途放弃。他决定,一定要亲眼看到这所学校的生死——或者找到一种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,或者倒闭。而这,也许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绕不开的宿命。



▲燕兆时(右)和孩子们的合影。 (志愿者提供)



▲由家具厂仓库改建成的简陋的学校。 (志愿者提供)

支撑不住回老家了。燕兆时成了全职校长,延续了19年的科研工作彻底放弃。

“学校几乎没有独生子女,很多孩子上学时,要带着四五岁的弟弟妹妹,因此,还得开一个学前班。”

燕兆时曾和朋友探讨过学校的发展,得出的结论是:这种打工子弟学校,根本没法做。

“连盈利模式都没有,怎么能坚持下去?”

“即使他们拿钱了,也是高尚的”

学校一年的运营印证了燕兆时的想法。两个学期,学校亏损近十万元。这些钱,多数由他补上。

给老师涨工资,就得继续赔钱。不过,学校12名全职老师的工资还是涨到了每月1600—2000元。此前工资在千元以内。

在这里,谈钱,是件很敏感、很尴尬的事。

燕兆时却因担心别人误会,更想说清楚,接手这所学校,不是为了钱。

“进账就是学生一学期600—700元的费用,支出能算明白,房租8万元,再加上工资、校车费、文具费、人工费。”燕兆时生怕别人不相信似的,又补充:“真想赚钱我还做原来的工作,这样的学校,能压榨出多少呢?”

这样的学校,在北京五环外的六里屯。

8月10日下午1点多,安静的小院里,北边是落满灰尘的8间教室,塞进200多个学生后满满当当,其中一间还没有屋门。房顶是一层彩钢板,冬冷夏热。

王海龙一个人值班,刚刚吃完一包煮过的方便面。

这个28岁的山西小伙,一年前来到这里,和其他几个人帮着燕兆时管理学校。

说是管理,实际上他是个不折

不扣的“一等杂役”。

“给食堂买菜,开校车接送学生。”王海龙的另一个身份是格桑花西部支教公益组织的成员,“去西部支教路费太贵了,在哪儿都不都是支教吗?”

“我们5个人一分钱都不拿,纯粹是义务帮忙。”这句话,他说得很平静,“李娟老师是今年初辞职来上课的,魏老师家人以为他还在证券公司,郭老师也是全职义工。”

在博客里,燕兆时不止一次感谢这几个不需要回报的人,因为他当面说不出来。但这让他更有压力。

“他们本可以过得比现在轻松,去享受生活或从事高薪工作。但当初不伸援手,这个学校就不存在了。”

说不出口的感谢,还送给拿工资的老师,比如说“燕京小小”。

“燕京小小”是辞掉原来工作来学校的,尽管这点工资还不能解决北京城最基本的生活支出。

“这里的工资待遇是我所做的工作中最低的,工作环境也是最差的。”很奇怪,“燕京小小”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,“只想在这里多做一天,看到孩子们因为我的存在而开心”。

燕兆时坚持认为,很多拿工资的老师也得养家糊口,他们选择这个学校,就是奉献爱心。

“给你这些钱,你愿意来做吗?既使他们拿钱了,也是高尚的。”

“长大后想推销啤酒、开小铺、当保镖”

困扰燕兆时的,并不只有学校的生存窘境。

每天早上上课前,燕兆时会召集200多个学生召开十分钟左右的例会。“最费口舌的,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找到自信,并认识自己。”

学生们渐渐长大了,可他们的理想却在褪色。这让燕兆时有时感

觉到无力,他只能不厌其烦地开会,不住嘴地说。

比如说,面对“长大了做什么”的问题,一、二年级孩子的回答和普通孩子没有区别:当老师、当科学家、当老板、当县长……丰富而多彩。

而到了五、六年级,孩子会说,自己长大后想推销啤酒、开小铺、当保镖。

这样的变化,让燕兆时很意外。可想了想,他又觉得很正常。

“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,理想和现实挂钩了。他们周围都是底层打工的穷人,被周围环境改变人生观,这是必然的。”燕兆时觉得很悲哀,“十来岁的孩子,不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,能当大老板,能考上清华北大吗?”

可是,和孩子们聊天时,听到的却是,“他们认为推销啤酒比做保洁更好,因为可能他姐姐就是做这个的。他们知道,姐姐成不了科学家,所以自己也不可能。”

很快,燕兆时发现还有更悲哀的事情。

有的孩子很聪明,如果努力,将来会考上重点大学。学校老师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孩子家长。

家长听说后很吃惊:“腔兮兮的孩子,怎么可能?我和他妈都是没学问的,他这样的,过几年就该去打工了,怎么可能读书呢?”

显然,大多数家长并不具有指导子女成长的能力。在这所打工子弟学校里,孩子需要更多的引导。

所以,半年前,这所学校的名字悄悄变成了“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”。

燕兆时的理论是:当你把一只天鹅放到鸭子群里,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鸭子,并且是最丑的鸭子。时间长了,你也会认为自己就是一只鸭子。

“我们想让孩子们认为,你本来就是小天鹅。”

和学校名字一起变化的,还有上学费用的减免。

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,燕兆时用此前一直给贫困学生减免的费用,设立了两万多元的“燕京小天鹅奖学金”,并通过这种方式“还”给他们。

“同样的事,一定要换一种方式去做,你不能让孩子们觉得,这是在施舍他们。”

“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真的很便宜”

“如果要我退回到一年之前,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,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想做的。”燕兆时说他能看明白自己的决心,却看不明白一些事情。

他和学校的义工、老师都不太愿意和亲戚朋友谈自己现在做的事情。因为别人总是问:不赚钱做这事干吗啊?

这时,燕兆时和几位同事的自我评价往往与周围人一致:一群理想主义者。

“他们说接手这所学校是不靠谱的事,这么多孩子是你们能解决得了的吗?但有什么不靠谱的?如果有2000人帮助200多个孩子,不就解决了?”

在他看来,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真的很便宜。1200元就够一个孩子读一年书了,10个人资助一个孩子的话,一年才支出120元,这件事情并不难啊。

当校长一年多,燕兆时清楚地记得很多学生的故事。

今年年初,他发现有些孩子中午吃零食,多少有些反感,觉得不应该花这些冤枉钱。

“不贵呀,一包干脆面才4毛多,就算吃两包也不到一块钱。”听了这位学生母亲的话,燕兆时的思维断电了,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
前些日子,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丢了五毛钱,燕兆时答应给她五毛钱,但兜里没零钱,就跟她说明天给。

“第二天忘记了,第三天,她找到我,低声说:老师,你说过给我5毛钱的。”燕兆时立刻掏出钱,还是没有五毛,给她1元钱。

又过了一天,女孩在院子里找到燕兆时:“老师,还给你5毛钱。”

张计鹏在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(OCEF)做了五年的兼职义工,今年3月,他因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的图书资助申请走访过学校。

他发现,本该上六年级的谢智慧,却在上三年级。因为母亲病故,父亲离家,她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、奶奶生活。失学三年后,志愿者通过走访重新把她纳入学校,一切费用全免。

“真正深入一件事情,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问题,只看表面,会觉得事情很简单。”燕兆时说,“我们就是一群怀着理想的人,去执着地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,小到可能不能再小了。希望全社会能理解,不是理解我,而是理解这件事。”

在这所学校里,一些悲情的东西确实很吸引人,但燕兆时总是欲言又止。他不想展示这些,因为这是“不公平的”。

燕兆时一直有个想法,一定要看到这所学校的生或死——或者找到一种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,或者看着学校倒闭。

“我不会在看到它生死之前去逃避的。但有一天坚持不下去了,怎么办?还能怎么办?这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。”燕兆时顿了顿,手指在桌子上狠狠敲了几下,“就像是我得了癌症马上要死了,你说怎么办?你不想死不就得死啊?”